

#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 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

田北海 耿宇瀚

**摘要** :论文基于对湖北省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以社会交换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支撑,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降维为工具型职业交往、情感型职业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关照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六种类型,运用频次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总体水平偏低,二者的职业交往多于生活交往,工具型职业交往多于情感型职业交往,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多于亲密型、关照型生活交往;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其心理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其中,工具型职业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较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源自工具性因素和外在吸引;由于农民工与市民主要限于浅层次社会交往,其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为此,需要加快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壁垒,加强舆论引导,促进农民工社区参与和社区合作,加强农民工资本建设,以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及农民工心理融入。

**关键词** :农民工 市民 社会交往 心理融入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0730(2013)07- 0097- 11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由计划调控向促进融入转型<sup>[1]</sup>,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探讨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及其城市融入机制,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学术界的共识是,中国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sup>[2]</sup>或“虚城市化”状态<sup>[3]</sup>。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有着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sup>[4]</sup>,但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

工,其市民化进程均面临层层障碍。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主要将之归纳为制度环境、舆论环境和个体特质三个方面。其中,制度因素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三个方面<sup>[5]</sup>;舆论环境因素体现为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偏见和歧视<sup>[6]</sup>,个体因素主要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sup>[7]</sup>和社会资本<sup>[8]</sup>。为此,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改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环境<sup>[9]</sup>,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与积累方面改善其城市融入的个体条件<sup>[10]</sup>。

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现状,相关研究指出,从

整体上看,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老乡、家庭与工友组成的非正式网络<sup>[11]</sup>,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非对称的共生关系<sup>[12]</sup>;在交往特征方面,农民工社会交往呈现明显的内卷化<sup>[13]</sup>,具有封闭性和内倾性<sup>[14]</sup>;在交往领域方面,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以工具性交往为主<sup>[15]</sup>,情感性交往占很小的比例,但正在逐步向开放型社会交往转变<sup>[16]</sup>。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行为正渐次地向理性化、非人格化和正式化过渡<sup>[17]</sup>,并呈现空间转移、对象变化、交往媒介多样化及意识形态异化等新特点<sup>[18]</sup>。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主要将其归纳为心理和环境两个方面,即: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位差影响其社会交往<sup>[19]</sup>,农民工住房条件差、生活空间边缘化亦限制了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sup>[20]</sup>。

已有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农民工融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浅层次的经济融入和整体层次的市民化,忽视了作为中间链条的社会交往;现有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研究仅从整体层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特征,未能对其在职业和生活两种不同场域的社会交往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研究视角方面,或者仅从农民工自身需要和行为逻辑出发,分析其市民化现状及困境;或者仅从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出发,探讨影响其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忽视城市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或阻滞作用。再次,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从理论、逻辑层面对农民工社会交往进行探讨,以实证调查为基础、以群际互动理论为支撑的系统研究还不够充分。

基于此,本文以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社会交换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支撑,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划分为职业交往和生活交往两大不同类型,深入探讨农民工与市民在不同场域的社会交往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

##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社会交换论指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交换行为。社会交换源自于社会吸引,通过交换,人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内在报酬和外在报酬,另一方面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由于交换各方在吸引力方面存在差异,在交换中会形成权力和地位的不均衡,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的整合和分化<sup>[21][22]</sup>。

基于社会交换论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城市的先进文明与优越生活对农民工有巨大的社会吸引,城市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便捷的公共服务等构成了对农民工的外在报酬;对于市民而言,多数农民工从事着一般市民不愿从事的底层工作,他们为城市建设及满足市民生活需要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及市民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吸引。于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换成为可能。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多数市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农民工。因此,在与市民的交换过程中,农民工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其对市民的社会吸引主要表现为物质、工具方面的外在吸引,而不是精神层面的内在吸引。相应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以获取物质报酬的工具性交往为主,而以获取精神层面内在报酬的情感性交往相对较少;在交换关系不平等的前提下,其生活交往往往仅限于浅层次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现状的假设如下:

假设 1: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相对较少,且主要限于浅层次的社会交往。具体表现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以职业交往为主;在职业交往中,工具型交往多于情感型交往;在生活交往中,浅层次礼节型、互惠型交往多于深层次亲密型、关照型交往。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的接触是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减少群际偏见的最主要方式。<sup>[23]</sup>然而,群际接触要想产生积极效应,尚需具备四个条件,即:平等的群体地位;共同的目标;群际间的合作;权威、法律和习俗的支持。<sup>[24]</sup>

逐一分析上述四个条件,不难发现:第一,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农民工一直是弱势群体,二者的地位并不平等;第二,尽管一些农民工正尝试融入城市社会,但其与市民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两大群体很少有共同目标;第三,缘于工具性需要,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日渐深入,工作场域中合作型群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强化,然而由于居住空间的隔离(多数农民工居住在工地、厂房或单位宿舍),多数农民工与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集很小,生活场域中合作型群体关系尚有待拓展;第四,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但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也在经历由限制到服务的转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法律、政策环境也在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积极效应开始获得更多权威、法律和习俗的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影响其心理融入的假设如下:

假设 2: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和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显著相关;但目前无论是职业交往,还是生活交往,都仅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 三、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4 月对湖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调查过程中,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分别抽取了 1 个省会城市(武汉)、2 个地级市(十堰和荆门)和 1 个

县级市(云梦);在每个城市按国有、民营、三资性质和大、中小企业规模的差别抽取 6 个企业,在每个企业内各随机抽取 10~20 名(中小企业 10~15 名、大型企业 20 名)农民工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 480 份问卷,收回问卷 418 份,回收率为 87.1%。

从表 1 所列的调查样本特征来看:(1)在来源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本省(79.5%),其中,45.7%的样本来自本市;(2)在性别分布上,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有有效样本的 57.1%;(3)在年龄分布方面,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1.5 岁,青壮年劳动力比例高达 74.5%;(4)在婚姻状况方面,调查对象以已婚农民工为主,占有有效样本总数的 63.4%;(5)在行业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建筑装饰业和餐饮住宿业,即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受访者居多;(6)在单位规模方面,多数农民工(74.3%)在雇员人数为 500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业;(7)在单位所有制性质方面,多数农民工(75.2%)在私营、民营、个体经营等体制外单位就业。样本特征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sup>[25]</sup>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样本特征大致相同,说明此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二)测量指标的操作化

##### 1. 社会交往测量指标的操作化与因子分析

###### (1) 社会交往测量指标的操作化

本文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一级指标下设职业交往和生活交往两个二级指标。在职业交往二级指标下,设置了 8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2 第 1 列);在生活交往二级指标下,设置了 15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3 第 1 列)。在测量上述指标时,分别询问农民工在工作中和工作之余与市民在各方面互动的频繁程度,按“从不”、“很少”、“偶尔”、“经常”、“总是”的顺序以 1~5 分对每一个变量进行赋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在该指标下与市民的交往频繁程度越高。

###### (2) 职业交往的因子分析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的描述统计

类别	变量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来源地	本市	189	45.7
	本省但非本市	140	33.8
	外省	85	20.5
性别	男	236	57.1
	女	177	42.9
年龄	29 岁及以下	190	46.6
	30~39 岁	144	27.9
	40~49 岁	85	20.8
	50 岁及以上	19	4.7
婚姻状况	已婚	246	63.4
	未婚	142	36.6
文化程度	未受过正式教育	18	4.3
	小学	34	8.2
	初中	194	46.9
	高中、中专或技校	140	33.8
	大专	27	6.5
	本科及以上	1	0.2
所在行业	加工、制造业	162	40.0
	建筑、装饰业	86	21.2
	餐饮住宿业	102	25.2
	其他	55	13.6
单位规模	99 人及以下	119	29.5
	100~499	181	44.8
	500~1999	49	12.1
	2000 人以上	55	13.6
单位所有制性质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84	20.6
	集体企事业	17	4.2
	个体经营	46	11.3
	私营 / 民营企事业	231	56.8
	外资企业	5	1.2
	中外合资企业	23	5.7
	其他	1	0.2

注:表中样本数量加总后不等于有效样本数,原因是部分样本答案存在缺失值。

鉴于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变量较多,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对职业交往和生活交往下的三级指标分别进行降维,以形成少量有代表性、概括性强、互相之间存在独立性的公因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采用 KMO 样本测度以及 Bartlett 球体测试对农民工与市民职业交往的 8 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24,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153.22,且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上述 8 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采用主成份法抽取因子,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极大方差法对因子矩阵作变换。通过降维,得到旋转成份矩阵。如表 2 所示,两个主成份特征值均大于 1,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65.25%。因此,可以提取公因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及每个公因子所涉及的指标内容,将公因子 1 命名为“工具型职业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在工作过程中围绕工作本身而展开的社会交往,主要解释“相互讨论工作”、“彼此协助对方的工作”、“向对方传授工作经验”和“就工作问题展开争论或表示反对意见”4 个变量;将公因子 2 命名为“情感型职业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在工作过程中因情感和归属需要而展开的社会交往,主要解释“聊天、谈家常”、“开玩笑”、“讨论对方的感觉和情绪”和“一起吃饭、喝酒”4 个变量。

提取公因子后,以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两个公因子得分,并由此生成两个新的变量(因篇幅所限,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及方程未在文中列出)。

### (3)生活交往的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采用同样方法对农民工与市民生活交往的 15 个变量进行相关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0,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2589.82,且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2 农民工与市民职业交往的旋转成份矩阵

	成份	
	F1	F2
相互讨论工作	0.85	0.15
彼此协助对方的工作	0.83	0.12
向对方传授工作经验或技巧	0.80	0.19
就工作问题展开争论或表示反对意见	0.65	0.35
聊天、谈家常	0.12	0.86
开玩笑	0.23	0.83
讨论对方的感觉或情绪	0.12	0.79
一起吃饭、喝酒	0.33	0.58
新因子命名	工具型职业交往	情感型职业交往
特征值	2.64	2.58
KMO 值	0.83	
Bartlett's 球形检验	$\chi^2=1153.22df=28$	Sig.=0.000
解释量(%)	32.95	32.30
累计解释量(%)	65.25	

表明上述 15 个变量达到了因子分析要求。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采用同样方法得到生活交往的旋转成份矩阵。如表 3 所示 4 个主成份特征值均大于 1,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68.57%。因此,可以提取公因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及每个公因子所涉及的指标内容,将公因子 3 命名为“互惠型生活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以互帮互助为表现形式的日常生活交往,主要解释“对方生病时给予问候”、“对方有经济困难时借钱、捐物”、“对方生病时给予照顾”、“日常生活中帮点小忙”和“相互排忧解难、倾诉、开导”5 个变量,将公因子 4 命名为“关照型生活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发生的为对方提供深层次关怀和照顾的生活交往,主要解释“帮助对方协调家庭矛盾和纠纷”、“帮助对方管教、照顾子女”、“为对方解决婚姻、恋爱问题牵线、搭桥”和“在对方受到权利侵害时,为其主持公道”4 个变量,将公

表 3 农民工与市民生活交往的旋转成份矩阵

	成份			
	1	2	3	4
见面时打招呼	0.19	-0.02	0.83	0.01
在一起聊天、拉家常	0.15	0.14	0.74	0.28
逢年过节互致问候	0.31	0.20	0.68	0.24
平时互相串门,到对方家里做客	0.19	0.22	0.46	0.60
一起吃饭、喝酒	0.21	0.18	0.27	0.77
一起休闲、娱乐	0.17	0.12	0.04	0.85
日常生活中互相帮点小忙	0.71	0.08	0.21	0.33
对方有经济困难时借钱、捐物	0.74	0.22	0.14	0.32
对方生病时给予问候	0.79	0.21	0.31	0.09
对方生病时给予照顾	0.74	0.40	0.06	0.08
相互排忧解难、倾诉、开导	0.68	0.26	0.27	0.06
为对方解决婚姻、恋爱问题牵线、搭桥	0.17	0.69	0.02	0.14
协助对方管教、照顾子女	0.18	0.79	0.17	0.12
帮助对方协调家庭矛盾与纠纷	0.20	0.84	0.12	0.07
在对方受到权利侵害时,为其主持公道	0.41	0.63	0.06	0.20
新因子命名	互惠型生活交往	关照型生活交往	礼节型生活交往	亲密型生活交往
特征值	3.21	2.68	2.28	2.12
KMO 值	0.90			
Bartlett's 球形检验	$\chi^2=2589.82df=105Sig.=0.000$			
解释量(%)	21.40	7.84	15.22	14.11
累计解释量(%)	68.57			

因子 5 命名为“礼节型生活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用于维系关系的浅层次日常生活交往,主要解释“见面时打招呼”、“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和“逢年过节互致问候”3 个变量;将公因子 6 命名为“亲密型生活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为促进友谊而进行的较深层次生活交往,主要解释“一起休闲、娱乐”、“一起吃饭、喝酒”和“平时互相串门,到对方家里做客”3 个变量。按交往层次排列,由浅入深依次为“礼节型生活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亲密型生活交往”和“关照型生活交往”。

提取公因子后,以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分别计算 4 个公因子得分,并由此生成 4 个新的变量。

## 2. 心理融入指标的操作化

本文将农民工的心理融入设为一级指标,下设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平感、适应性和自我认同 3 个二级指标。

其中,在“公平感”二级指标下设 5 个三级指标,分别是(1)收入没有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2)工资是否经常受到老板的克扣;(3)感觉社会对自己不公平;(4)感受到城里人对外来打工者的排斥;(5)感到在城里低人一等。在测量上述指标时,分别询问调查对象有上述各种感受的频繁程度,按“总是有”、“经常有”、“偶尔有”、“很少有”、“从没有”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进行赋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融入度越高。

在“适应性”二级指标下设 8 个三级指标,分别是(1)我不喜欢农村的生活;(2)我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3)我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留在城市;(4)我已经熟悉了打工地的语言;(5)在城里打工以来,我感觉自己的地位提高了;(6)城里的工作对于我很重要;(7)我能够与城里人和睦相处;(8)我能够与城里人成为朋友。在测量上述指标时,分别询问上述各种说法与调查对象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按“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好

说”、“比较符合”、“完全符合”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进行赋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融入度越高。

在“自我认同”二级指标下设 9 个三级指标,分别是:(1)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农民工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3)城市对外地人的各种限制太多;(4)农民工只能在城市干脏活、累活、重活;(5)农民工抢了城市人的工作机会;(6)农民工影响城市社会治安;(7)农民工加剧了城市交通压力;(8)农民工影响城市环境、卫生;(9)农民工增加了城市负担。在测量上述指标时,请调查对象就上述说法逐一做出评价。其中,前 2 个指标按“完全反对”、“不太赞同”、“不好说”、“比较赞同”、“完全赞同”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进行赋分;后 7 个指标按相反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进行赋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融入度越高。

在计算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度时,本文采用算术平均值算法,取公平感二级指标下所有 5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公平感水平的得分均值;取适应性二级指标下 8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适应性水平的得分均值;取自我认同二级指标下 9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自我认同水平的得分均值;取公平感水平、适应性水平和自我认同水平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的得分均值。

## 四、结果分析

### (一)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现状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4),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总得分均值为 2.78,其交往水平介于“很少交往”与“偶尔交往”之间,且倾向于“偶尔交往”。其中,39.2%的农民工与市民“很少交往”,27.8%的农民工与市民“偶尔交往”,尚有 13.2%的农民工与市民“从不交往”。上述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与市民交往频繁程度偏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

与市民职业交往的得分均值为 2.90，生活交往的得分均值为 2.63，前者得分均值略高于后者。可见，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多于生活交往。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工具型职业交往的得分均值是 2.95，情感型职业交往的得分均值为 2.85，两种类型的职业交往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工具型职业交往的得分均值要稍高于情感型职业交往。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礼节型生活交往的得分均值最高，为 3.25 分，其交往水平介于“偶尔交往”与“经常交往”之间；互惠型生活交往的得分均值次之，为 2.88 分，其交往水平介于“很少交往”与“偶尔交往”之间，且倾向于“偶尔交往”；亲密型生活交往的得分均值较低，为 2.36 分，其交往水平介于“很少交往”与“偶尔交往”之间，且倾向于“很少交往”；关照型生活交往的得分均值最低，为 2.07 分，其交往水平接近于“很少交往”。可见，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浅层次的礼节型交往、互惠型交往多于深层次的亲密型交往和关照型交往。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还极其有限，且交往层次较浅，多以工具型职业交往和浅层次的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为主。由此，原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4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得分的描述性分析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一级指标	社会交往总得分	322	2.78	0.58
二级指标	职业交往	361	2.90	0.74
	生活交往	360	2.63	0.64
三级指标	工具型职业交往	369	2.95	0.87
	情感型职业交往	367	2.85	0.85
	互惠型生活交往	380	2.88	0.79
	关照型生活交往	381	2.07	0.78
	礼节型生活交往	392	3.25	0.81
	亲密型生活交往	393	2.36	0.84

### (二) 农民工心理融入现状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5），农民工在公平感水平、适应性水平和自我认同水平方面的得分均值分别为 3.64、3.49、3.80，其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得分均值为 3.64。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职业身份认同方面，40.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31.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27.6%的农民工“说不清”；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5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乡下人”，35.1%的农民工“说不清”，仅有 13.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上述数据表明，多数农民工已经开始形成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但其心理融入水平仍然较低。

### (三)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与其心理融入水平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总得分与其心理融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267，显著性水平  $p$  值为  $0.000 < 0.01$ ，表明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和农民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整体水平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 6），农民工与市民的礼节型生活交往、亲密型生活交往与其公平感知水平显著正相关；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六种不同类型均与其适应性水平显著正相关；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六种不同类型均与其自我认同水平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与其和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密切相关，并很有可能受到社会交往水平的影响。由此，原假设 2 部分得到验证。

表 5 农民工心理融入的描述性分析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一级指标	心理融入整体水平	356	3.64	0.48
二级指标	公平感水平	392	3.64	0.93
	适应性水平	376	3.49	0.72
	自我认同水平	390	3.80	0.61

表 6 农民工与市民各类型社会交往与三种类型心理融入水平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工具型职业交往	情感型职业交往	互惠型生活交往	关照型生活交往	礼节型生活交往	亲密型生活交往
公平感	0.064	0.070	0.051	-0.042	0.164**	0.134**
适应性	0.228**	0.123*	0.188**	0.187**	0.136**	0.126*
自我认同	0.175**	0.125*	0.215**	0.134*	0.196**	0.112*

注: \* $p < 0.05$ , \*\* $p < 0.001$

(四)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基于前文的假设, 本文将农民工与市民各种类型的社会交往设为自变量, 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设为控制变量, 将农民工心理融入的整体水平、心理融入的三个维度(公平感水平、适应性水平和自我认同水平)分别设为因变量  $Y_1$ 、 $Y_2$ 、 $Y_3$  和  $Y_4$ , 进而构建社会交往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Y_i$  为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水平,  $X_i$  为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即自变量,  $\beta_i$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beta_0$  为常量。

模型 1 显示(见表 7), 工具型职业交往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与市民的工具型职业交往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 其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得分就增加 0.085 倍。在控制变量中, 性别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有显著影响, 女性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得分比男性高出 13.6%。

模型 2 显示(见表 7), 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分别在 95% 和 99%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 农民工与市民礼节型生活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 其公平感水平就提升 0.19 倍; 农民工与市民亲密型生活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 其公平感水平就提升 0.276 倍。在控制变量中, 性别和文化程度分别在 99% 和 95% 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公平感有显著影

响。具体表现为: 女性农民工的公平感水平是男性的 0.327 倍; 农民工的学历层次每上升 1 个档次, 其公平感水平就下降 0.144 倍, 即农民工学历层次越高, 其不公平现实的感知越强烈。

模型 3 显示(见表 7), 工具型职业交往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适应性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与市民的工具型职业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 其城市适应性水平就提升 0.12 倍。

模型 4 显示(见表 7), 互惠型生活交往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水平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与市民的互惠型生活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 其自我认同水平就提升 0.161 倍。在控制变量中, 年龄在 99%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自我认同水平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年龄每增加 1 岁, 其自我认同水平就下降 0.016 倍。

在农民工与市民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交往中, 情感型职业交往和关照型生活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及各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 情感型职业交往相对缺乏;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 关照型生活交往普遍缺乏。因此, 两种交往类型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积极影响尚无法在数据中得到显现。

综上所述,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 工具型职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及适应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 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公平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互惠型生

表 7 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整体融入水平	公平感水平	适应性水平	自我认同水平
(常量)	3.086**	2.919**	2.248**	3.905**
工具型职业交往	0.085*	0.108	0.120*	0.041
情感型职业交往	-0.011	-0.065	0.068	-0.017
互惠型生活交往	0.021	-0.111	0.015	0.161*
关照型生活交往	-0.013	-0.157	0.116	0.009
礼节型生活交往	0.076	0.190*	-0.016	0.046
亲密型生活交往	0.088	0.276**	0.043	-0.035
性别	0.136*	0.327**	0.040	0.053
年龄	-0.003	-0.002	0.009	-0.016**
文化程度	-0.037	-0.144*	0.063	-0.032
婚姻	-0.078	0.011	-0.108	-0.137
样本数	265	282	275	280
F 检验	3.384**	3.985**	3.446**	3.312**
R <sup>2</sup>	0.118	0.128	0.115	0.110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083	0.096	0.082	0.077

注: \* $p < 0.05$ , \*\* $p < 0.001$

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回归系数均小于 0.3,表明其影响均比较微弱。也就是说,无论是整体层次的社会交往,还是职业交往或生活交往,都仅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由此,原假设 2 得到验证。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以社会交换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降维划分为工具型职业交往、情感型职业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关照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六种类型,并运用频次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和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总体水平偏低,二者的职业交往多于生活交往,工具型职业交往多于情感型职业交往,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多于亲密型、关照型生活交往。

第二,尽管多数农民工已经开始形成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但多数农民工尚未实现在城市社会的心理融入,其心理融入水平仍然较低。

第三,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其心理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工具型职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及适应性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

型生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公平感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互惠型生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和公平感水平有显著影响,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上述两个维度的融入水平更高;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公平感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的不公平感越强烈;年龄对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年龄越大,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水平越低。

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还极其有限,且交往层次较浅,多以工具型的职业交往和浅层次的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为主,其社会交往主要源自于工具性因素和外在吸引。由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源于工具性因素和外在吸引,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其社会交往中从对方所获得的报酬均以经过计算而形成的“工具性赞同”等外在报酬为主,均较少获得以“社会承认”为表现形式的内在报酬<sup>[21]</sup>。由于内在吸引和内在报酬的缺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源于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及两大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及经济社会地位方面的显著差异,两大群体的交往关系是不平等的,二者也尚未形成群际交往的共同目标,其合作领域亦有待拓展和深入,促进二者平等、和谐互动的政策与制度、舆论与观念环境亦尚需要完善。因此,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积极效应的显现尚需时日。

因此,要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及其心理融入,首先,要加快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壁垒,不仅在称谓上而且在实质上赋予农民工“市民权”,缩小乃至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其次,要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增强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传

播、提升农民工与市民和谐互动的正能量;再次,要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体系,在让更多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促进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及其与市民的社区合作,增进农民工与市民的了解与认同,培养共同体意识与城市认同感;最后,要帮助农民工在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就业能力的同时,提升其文化素质,拓展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提升其融入城市的个体条件。

注释:

- [1]田北海:《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探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 [2]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 [3]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 [4]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 [5]刘传江:《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与市民化》,《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年第11期。
- [6]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兰州学刊》,2007年第7期。
- [7]金崇芳:《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实证分析》,《资源科学》,2011年第11期。
- [8]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 [9]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理论月刊》,2006年第10期。
- [10]李培林:《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1]刘建城:《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人口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12]周春发:《从冲突走向融合——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 年第 12 期。

[13]叶鹏飞:《探索农民工社会融合之路——基于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2 年第 1 期。

[14]熊风水:《流动的象征边界——“平民型”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隔离状况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

[15]郎晓波、愈云峰:《农民工融入当地社区的壁垒及实践策略研究——基于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群际关系的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16]纪韶、李舒丹:《北京市农民工生活方式五年间转变的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2010 年第 2 期。

[17]汪国华:《新生代农民工交往行为的逻辑与文化适应的路向》,《中国青年研究》,2009 年第 6 期。

[18]荆晓燕:《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径优化》,《重庆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0 期。

[19]金萍:《推动群际接触 实现群际和谐——武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的实证调查》,《学习与实践》,2008 年第 7 期。

[20]关信平、刘建娥:《我国农民工社区融入的问题

与政策研究》,《人口与经济》,2009 年第 3 期。

[21](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22](美)彼得·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23]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537.

[24] Pettigrew .T. F. *Inter 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49): 65-85.

[25]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第 71~72 页。

\* 本文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农民工的就业、居住与融入问题研究”(编号[2007]068)的研究成果,同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 2011PY012; 2012SC44)和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资助。

作者简介:田北海,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访问学者,湖北武汉 430070 耿宇瀚,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 430070。

(责任编辑:羽林)